

SUS-TAS 在博彩目的地的應用： 總體態度的中介作用

李湘萍 龔永珩 葉 雅

(澳門旅遊學院, 澳門)

摘 要:本研究旨在驗證 21 題項的 SUS-TAS 量表的適用性, 並研究總體態度對 SUS-TAS 維度和居民對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之間關係的中介作用。通過在博彩旅遊目的地收集的數據, 研究證實了 21 項量表是一個具有信度和效度的七維結構。研究結果還顯示, 感知經濟效益、以社區為中心的經濟和確保遊客滿意度等維度對總體態度有正向影響, 感知社會成本顯示出負向影響。同時, 總體態度亦是上述維度與居民支持度之間的有效中介變量。然而, 環境可持續性、長期規劃和最大化社區參與未能影響總體態度, 總體態度也無法對這些因素和居民支持度之間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結果對理論和實踐都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SUS-TAS 量表; 總體態度; 居民支持度; 博彩目的地; 可持續旅遊發展; 澳門
中圖分類號:F590

Application of SUS-TAS in a Gaming Destin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Overall Attitude

Xiangping Li Weng Hang Kong Nga Ip

(Macao Institute for Tourism Studies, Macao)

作者簡介: 李湘萍, 澳門旅遊學院旅遊管理學校副教授; 龔永珩, 澳門旅遊學院旅遊管理學校副教授; 葉雅, 澳門旅遊學院酒店管理學校本科畢業生。

Abstract: The research aimed to examin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21-item SUS-TAS scale as well as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overall attitude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US-TAS dimensions and resident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a gaming destination, the research confirmed that the 21-item scale yielded a reliable and valid seven-dimensional structure. The results also revealed that, while the dimensions of perceived economic benefits, community-centered economy, and ensuring visitor satisfaction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overall attitude, perceived social cost had a negative effect. Overall attitude was found to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forementioned dimensions and resident support. Howeve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long-term planning and maximiz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failed to influence overall attitude, and overall attitude was an irrelevant mediator between those factors and resident support. The findings shed some insights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SUS-TAS; overall attitude; resident support; gaming tourism destination;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Macao

1 研究背景

澳門“賭權”開放和“自由行”政策 (IVS) 的實施使澳門的經濟發展進入黃金時期。2017 年,澳門的生產總值達到 4,057.9 億澳門元,人均 625,254 澳門元 (77,902 美元),使澳門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 (DSEC, 2018)。雖然旅遊業可為社區創造可觀的經濟效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Choi & Sirakaya, 2005; Su, et al., 2018),旅遊業也因擾亂當地社區和社會規範、破壞社會結構及剝奪社區個性而臭名昭著 (Nunkoo & So, 2016; Su, et al., 2018)。因此,如何使旅遊得以可持續發展引起學者及業界的長久關注 (Bramwell & Lane, 1993; Hall, 2019)。旅遊的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於上世紀 80 年代提出並盛行,是指旅遊的發展需要在各個利益相關者之間取得平衡,在為居民創造經濟利益、維護當地文化和保護環境的同時,滿足遊客的需求,並確保目的地的

長期生存發展的能力 (Su, et al., 2018; Wan & Li, 2013; Yu, et al., 2011)。在眾多利益相關者之中,當地居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為了評估居民對可持續旅遊發展的態度,基於新環境範式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NEP) 和社會交換理論 (Social Exchange Theory, SET), Choi 和 Sirakaya (2005) 開發了由 44 個題項測量、7 個維度組成的可持續旅遊態度量表 (Sustainable Tourism Attitude Scale, SUS-TAS)。

SUS-TAS 自誕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評估居民對可持續旅遊發展態度的有效工具,該量表被認為是可以比較全面地涵蓋可持續旅遊發展的不同方面,即“對生態負責、與社會相容、文化上適宜、政治上公平、技術上支援,以及最終對東道主社區經濟上有所助益” (Choi & Sirakaya, 2005)。SUS-TAS 已被學者在不同類型、不同文化背景的目的地進行了驗證,以評估該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Hsu, et al., 2020; Ribeiro, et al., 2018; Sirakaya-Turk, et al., 2008; Yu,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15)。儘管驗證產生了不同數目的題項,各因子結構仍與 Choi 和 Sirakaya(2005)開發的原始結構相同,即 7 個維度保持不變。不僅如此,雖然 SUS-TAS 量表被廣泛驗證,卻忽視了亞洲的旅遊目的地(Hsu, et al., 2020)。此外,Ribeiro 等人(2018)進行的一項最新研究表明,21 個題項的版本不僅可信、有效且非常簡約。他們還呼籲進行更多的研究以交叉驗證 21 題項版本的 SUS-TAS 量表。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是對 21 題項版本的 SUS-TAS 量表進行交叉驗證。

此外,儘管 SUS-TAS 和居民對可持續旅遊的支持之間的直接關係有所檢驗,Ribeiro 等人(2018)建議仍需要在模型中整合一些中介變量,對 SUS-TAS 與居民支持度之間的關係進行進一步考察。在所有可能的中介變量中,總體態度很重要,因為圍繞總體態度和支持度之間的關係存在很多模糊性,亟需明確(Prayag, et al., 2013)。另外,居民態度的中介作用在以往的研究有著不同程度的證明。例如,有研究表明整體態度在感知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對 2012 年奧運會支持之間起著中介作用(Prayag, et al., 2013);同時,也有研究發現居民態度並無法對地方形象上與旅遊發展的支持度直接的關係起到中介作用(Tournois & Djerić, 2019)。因此,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是以總體態度為中介變量,研究 SUS-TAS 和居民對可持續旅遊發展的支持度之間的關係。

2 研究綜述和模型假設

2.1 可持續旅遊發展態度量表(SUS-TAS)

基於新環境範式(NEP)和社會交換理

論(SET),Choi 和 Sirakaya(2005)開發了測量居民對可持續旅遊發展態度的量表,即 SUS-TAS。Choi 和 Sirakaya(2005)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收集居民數據,經過嚴格的開發和驗證過程,創建了一個由 44 個項目組成的量表,包括 7 個維度,即:環境可持續性,感知經濟效益,感知社會成本,長期規劃,以社區為中心的經濟,確保遊客滿意度,以及最大化社區參與。此後,SUS-TAS 在不同背景下進行了交叉驗證(Hsu, et al., 2020; Ribeiro, et al., 2018; Sirakaya-Turk, et al., 2008; Yu,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15)。例如,Sirakaya-Turk 等人(2008)使用土耳其和塞浦路斯的居民驗證了該量表。雖然 7 個維度保持不變,題項總數從 44 個減少至 33,他們亦聲稱,較短的版本擁有更高的可靠性和有效性。Sirakaya-Turk 和 Gursoy(2013)在南卡羅來納州進一步證實了 SUS-TAS 量表的較短版本(Sirakaya-Turk, et al., 2008)的信度和效度。最近,Ribeiro 等人(2018)從佛得角群島居民收集數據,對 SUS-TAS 的不同版本進行了比較驗證,其中包含 44 個題項(Choi & Sirakaya, 2005)、33 個題項(Sirakaya-Turk, et al., 2008)、27 個題項(Yu, et al., 2011)和 21 個題項(Zhang, et al., 2015)等不同版本。他們指出,所有版本的量表都會產生相同的七維結構,並且都有足夠的可靠和有效的測量特性。然而,21 個題項的版本被認為是最簡約,且具有更好擬合指數,由此提出 SUS-TAS 的較短版本“有利於更有效地收集數據,從而為其在大範圍的旅遊實踐中的廣泛應用提供了條件”(Zhang, et al., 2015)。他們還補充說明,未來的研究應該在不同的環

境和文化中交叉驗證 21 個題項的版本,以驗證該工具的普遍性。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在一博彩旅遊目的地對此較短的版本進行驗證。

2.2 模型假設

居民對旅遊發展影響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其對旅遊發展的態度;同時,居民對旅遊發展的態度亦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其對旅遊發展的支持度,影響當地旅遊發展之推動與遊客的旅遊品質。因此,了解居民對旅遊發展影響的認知與態度,是決定當地旅遊發展能否成功的重要課題 (Ap, 1992)。社會交換理論 (SET) 已被廣泛用作解釋居民態度和旅遊發展支持度之間關係的理論框架 (Li & Wan, 2013; Nunkoo & So, 2016; Ribeiro, et al., 2018)。該理論指出,居民以預期收益 (旅遊發展給目的地帶來的益處) 和成本 (旅遊發展對旅遊目的地造成的負面影響) 之間的交換來評估旅遊發展 (Ap, 1992), 如果預期收益大於成本, 個人更有可能參與交換 (即對旅遊發展表現出積極態度並予以支持); 另一方面, 如果當地居民認為旅遊開發的成本大於收益, 他們則會有可能反對或不支持旅遊發展 (Gursoy, et al., 2002; Li & Wan, 2013; McGehee, et al., 2002)。由於 SUS-TAS 包括 7 個維度的感知, 下文將對各個維度和總體態度之間的關係一一進行論述並提出相關假設。

由於旅遊業發展可能擾亂自然環境, 也造成當地空氣或水污染, 更嚴重的是影響或危害環境生態, 而可持續性與環境是息息相關的, 因此, 人們對環境有著不同程度的關注與認知。環境關注被描述為一個人對環

境的整體態度, 以及與環境問題相關的各種問題 (Zimmer, et al., 1994)。可持續性在旅遊目的地變得越來越重要, 人們對環境問題不同的認知有著不同的態度, 從而影響其購買選擇或意願, 例如是否預訂綠色酒店 (Baker, et al., 2014)。Ajzen (2001) 指出, 態度為一種性格, 是用來表達對某一事物、人物、制度或事件的看法。另一方面為了區分生態旅遊者的可持續性標準, 需要了解遊客對環境的態度和信念 (Zografos & Allcroft, 2007)。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1: 環境可持續性的認知與總體態度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旅遊可以為目的地吸引遊客從而為居民帶來經濟利益, 包括增加收入和創造就業機會。研究表明居民會透過旅遊帶來的經濟利益對旅遊發展形成積極的態度 (Kim, et al., 2013)。其他研究在調查居民感知經濟利益和其對旅遊發展的態勢時, 也發現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正面的 (Lv, et al., 2019)。它暗示了感知經濟利益與居民態度之間的關係對旅遊發展至關緊要, 而居民作為旅遊發展的重要利益群體, 他們的態度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說如果要改善居民的態度, 就需要提高居民對旅遊感知經濟效益, 才能得到居民對旅遊發展的支持。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2: 感知經濟效益與總體態度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旅遊業在社會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例如居民的價值觀和社會組織等。在旅遊發展的過程中, 居民能夠了解到旅遊現象產生的積極經濟影響, 以及負面社會文化和環境影響 (Tse, 2015)。研究表明, 當居民著眼

於旅遊對當地社會文化的負面影響時,包括由於遊客過多影響其生活質素等,居民對旅遊發展的態度會趨向消極 (Noor, et al., 2019)。為此,可以認為旅遊業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與居民態度之間存在關係,反過來考慮感知社會成本與態度之間的關係也是合乎邏輯的。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3:感知社會成本與總體態度之間存在負向關係。

當一個地區發展成旅遊目的地,居民可能會經歷由旅遊發展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的利益與成本。由此,為了更長遠的發展,需要對當地的旅遊發展進行長期規劃,因為長期的旅遊規劃不僅有助於監測目的地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影響,而且有助於改善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在長期規劃中,可持續發展應當作為旅遊規劃的指導原則;而居民是規劃和社區發展的基礎,在設計思維和實施中,將居民態度一併納入發展規劃考量中,有助於推動可持續性在旅遊目的地的落實,以實踐可持續發展策略 (Vogt, et al., 2020)。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4:長期規劃與總體態度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為了與可持續性發展原則保持一致,需要了解旅遊目的地各利益相關者,並滿足其需求,同時需要關注旅遊業對社區的可持續性發展的影響 (Sharpley, 2009)。事實上,從旅遊中獲益的社區居民,往往對旅遊發展有更多的積極看法和較少的負面看法 (Noor, et al., 2019)。當地社區居民支持並參與的旅遊發展,可成功地可持續性發展,並有效促進經濟收益。實際得到的經濟利益是影響居民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出

以下假設:

H5:以社區為中心的經濟與總體態度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在旅遊目的地中,居民和遊客分享共同的資源,他們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而旅行態度和旅行意圖之間的關係被發現是積極的 (Phau, et al., 2016)。然而,以往的研究在了解居民與遊客的關係上,通常是衝突的 (Pasquinelli & Trunfio, 2020)。若不能與當地居民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是會帶來負面影響與態度。同時遊客不能在目的地獲得滿意度,旅遊發展便會面臨難以可持續性的嚴重問題。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6:確保遊客滿意度與總體態度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旅遊目的地在推動旅遊發展時,若缺乏社區參與,將無法得到可持續性發展。在社區層面,考慮可持續規劃可以通過社區各級的參與性決策來改善社區成果 (Vogt, et al., 2020)。透過居民的主動參與,由各層面居民規劃自己的生活文化及環境,具有價值導向及系統整合旅遊規劃。也透過居民感知,有助於強化其正面參與態度,進而促進發展。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7:最大化社區參與與總體態度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為了獲得旅遊業的支持並實現可持續性發展,通過更多的感知價值來提高居民的滿意度至關重要 (Lv, et al., 2019)。旅遊產品可以通過人們的態度和行為來描述 (Butzmann & Job, 2017)。讓旅遊目的地有可持續性發展,居民對旅遊發展的感知與態度,也是決定性的條件。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8:總體態度與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對社區的感知影響和居民對其增長的態度是旅遊目的地需要考慮的重點(Pizam, 1978)。態度被認為是意圖的有效預測器(Ajzen, 2001),態度的概念可以增加對不同領域(包括可持續旅遊)人們行為的理解,並且可以在制定和監測干預政策方面發揮關鍵作用(Passafaro, 2020)。相關研究曾試圖通過居民對旅遊態度之前的因素,以理解為什麼居民支持或反對旅遊發展(Boley, et al., 2014)。在旅遊業發展的過程中,如果影

響條件(利益或受到的影響)改變,居民的態度也會發生改變,從而影響其對可持續旅遊發展的支持度。Çelik 和 Rasoolimanesh (2021)最近的研究指出,居民的總體態度(成本效益態度)的確可以在居民對旅遊業的態度和支持之間具有中介作用。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9:總體態度在 SUS-TAS 7 個因素與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之間的關係中起中介作用。

基於上述討論,提出了相關的概念框架(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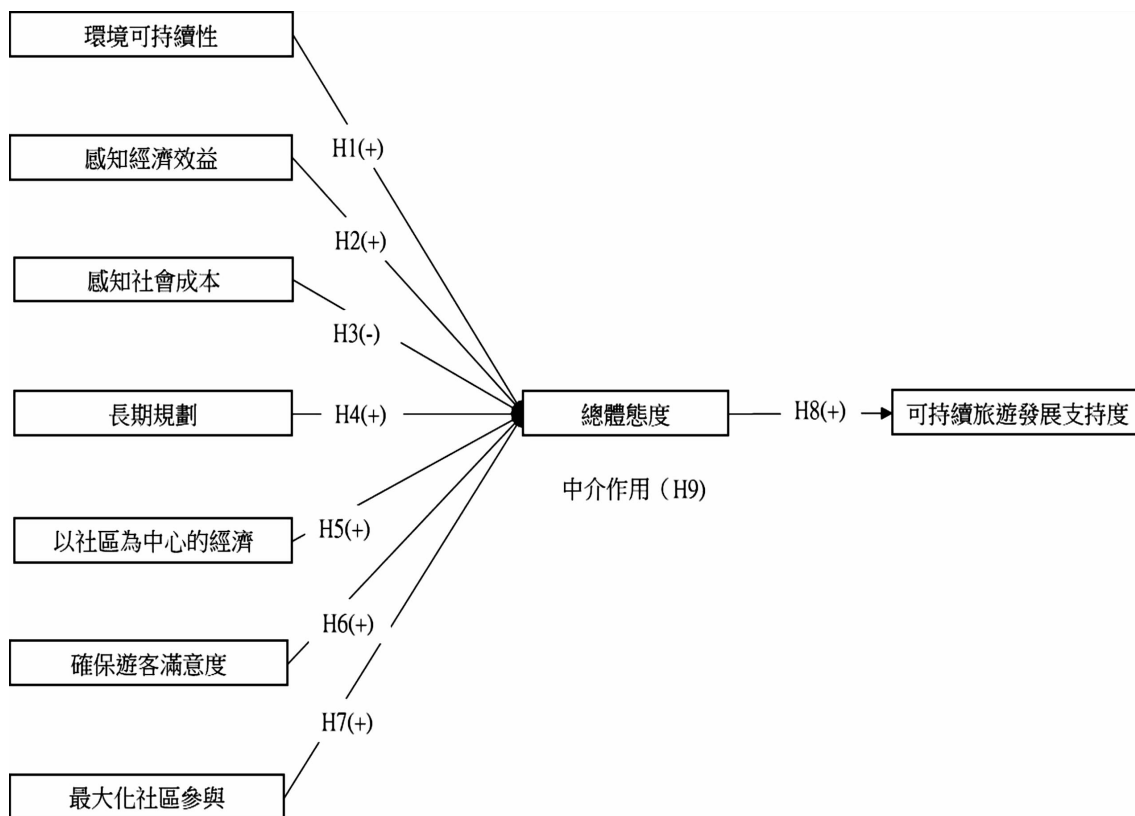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框架

3 研究方法

3.1 問卷設計及採樣

本研究採用問卷研究,針對主要研究變

量採用合適的量表加以測量。研究首先用英文設計了一份結構化問卷,隨後翻譯成中文(繁體中文)。然後將中文版本回譯成英文,以確保詞義的一致性。在收集數據時,只分發了中文問卷。問卷由四個部分組成。

第一部份採用 SUS-TAS 量表的 21 個題項版本,包括 7 個維度,每個維度用 3 個題項測量(Choi & Sirakaya, 2005;Ribeiro, et al., 2018;Zhang, et al., 2015);第二部份用兩個題項測量總體態度(Prayag, et al., 2013; Yoon, et al, 2001);第三部份用 6 個題項測量對可持續旅遊發展的支持度(Lee, 2013; Ribeiro, et al., 2018)。所有題項都以李克特 7 點量表進行評分(從 1 =非常不同意到 7 =非常同意)。第四部份收集居民的人口特徵信息。

本研究以 18 歲或以上的澳門居民作為樣本,進行一對一問卷調查。由於隨機取樣非常困難,故改採便利取樣。為力求樣本之異質性,調查員在澳門不同社區的中心區域和公園對居民進行攔截調查。數據在 2018 年的 3 個月內收集,所有受訪者在同意參與時都得到了匿名和數據保密的保證。共有 287 名受訪者同意參與問卷調查,並產生了 269 份完整有效問卷。

3.2 數據分析

數據運用 SmartPLS3.2 (Ringle, et al., 2015) 進行分析。首先使用驗證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對 21 項 SUS-TAS 量表進行驗證。其次,採用 Anderson 和 Gerbing (1988) 提出的兩階段程式法,即採用 CFA 來檢驗整體測量模式,之後採用 PLS-SEM (Partial Least Square -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來驗證所有的結構路徑(H1-H9)。PLS-SEM 方法與基於協方差的結構方程模型不同,PLS-SEM 對變量正態性分布的限制較少,且能夠有效處理較小樣本(Chin, 1998;Hair, et al., 2016)。

4. 研究結果

4.1 SUS-TAS 的驗證結果

用 CFA 對由 7 個維度組成的 21 個題項的量表進行了驗證。第一輪 CFA 分析表明,最大化社區參與維度中有一個題項(“澳門居民應該有機會參與旅遊決策”)負荷低於 0.40,因此將該項從量表中刪除,並進行了第二輪的 CFA,得到了令人滿意的結果(見表 1、表 2)。所有 7 個維度的綜合信度系數和 Cronbach Alpha 值都高於 0.70,每個構面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也大於 0.50(表 1),表明該量表有很好的信度及收斂效度(Bagozzi & Yi, 1988; Fornell & Larcker, 1981)。區分效度是在異質-單質相關比率(HTMT)的基礎上建立的,該比率優於常用的 Fornell-Larcker 交叉負荷值(Henseler, et al., 2015)。結果(表 2)顯示,除了感知經濟利益和社區參與最大化之間的相關度為 0.855,略高於 0.85 之外,所有構面的 HTMT₈₅ 值都低於 0.85 這一保守的臨界值(Hair, et al., 2016)。因此,SUS-TAS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表明其在博彩旅遊目的地的適用性。

4.2 整體測量模式

繼續使用 CFA 對整體測量模型進行驗證。模型包括 SUS-TAS 的 7 個維度、整體態度和對可持續旅遊發展的支持度。該測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的評估標準與評估 SUS-TAS 量表相同。表 3 和表 4 總結了測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系數,說明整體測量模型也是既可靠又有效的。因此,接下來可以對結構模型進行評估。

表 1 SUS-TAS 的信度和收斂效度

維度及題項	因子 負荷量	組合信度 (CR)	α	平均方差提 取值(AVE)
環境可持續性		0.900	0.900	0.750
我認為為了將來,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保護環境	0.828			
我認為旅遊業必須保護澳門的環境	0.895			
我認為為了後代,旅遊業必須改善環境	0.874			
感知經濟效益		0.803	0.805	0.578
我認為旅遊業對澳門的經濟貢獻是重大的	0.834			
我認為旅遊業使我們的經濟多元化	0.714			
我認為旅遊業惠及澳門其他行業	0.727			
感知社會成本		0.898	0.899	0.746
我認為由於旅遊業的原因,我的生活質素下降了	0.898			
我認為遊客擾亂了我的生活質素	0.828			
當地旅遊業的氛圍,讓我感到不舒服	0.864			
長期規劃		0.908	0.907	0.767
我認為在規劃旅遊業發展時,我們需要有一個長遠的眼光	0.835			
我認為成功的旅遊管理需要先進的規劃策略	0.914			
我認為當我們計劃旅遊業時,我們不能目光短淺	0.877			
以社區為中心的經濟		0.814	0.815	0.595
我認為澳門居民應從旅遊收益中獲得一個公平的份額	0.685			
我認為澳門居民應有更多機會投資旅遊業發展	0.785			
我認為旅遊業必須為澳門社區的改善作出貢獻	0.835			
確保遊客滿意度		0.775	0.775	0.539
我認為旅遊業必須確保遊客的優質旅遊體驗	0.860			
我認為旅遊企業有責任滿足遊客的需求	0.619			
我認為社區吸引力是吸引遊客的核心生態要素	0.703			
最大化社區參與		0.706	0.706	0.546
我認為澳門居民的全面參與是澳門旅遊業成功發展的必要條件	0.755			
我認為澳門居民應被賦予參與旅遊業決策的機會	0.722			

註:CR=composite reliability 組合信度; α =Cronbach's alpha; AVE=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平均方差提取值。

所有因子負荷量在 0.01 水平上顯著

表 2 SUS-TAS 區分效度:異質-單質比率

	1	2	3	4	5	6	7
1 環境可持續性							
2 感知經濟效益	0.641						
3 感知社會成本	0.165	0.111					
4 長期規劃	0.766	0.657	0.203				
5 以社區為中心的經濟	0.691	0.673	0.269	0.729			
6 確保遊客滿意度	0.579	0.785	0.055	0.685	0.822		
7 最大化社區參與	0.768	0.855	0.162	0.793	0.873	0.799	

表 3 總測量模式的信度和收斂效度

維度及題項	因子 負荷量	組合信度 (CR)	α	平均方差提 取值(AVE)
環境可持續性		0.900	0.900	0.749
我認為為了將來,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保護環境	0.818			
我認為旅遊業必須保護澳門的環境	0.881			
我認為為了後代,旅遊業必須改善環境	0.897			
感知經濟效益		0.804	0.805	0.578
我認為旅遊業對澳門的經濟貢獻是重大的	0.801			
我認為旅遊業使我們的經濟多元化	0.728			
我認為旅遊業惠及澳門其他行業	0.751			
感知社會成本		0.898	0.899	0.746
我認為由於旅遊業的原因,我的生活質素下降了	0.898			
我認為遊客擾亂了我的生活質素	0.828			
當地旅遊業的氛圍,讓我感到不舒服	0.864			
長期規劃		0.908	0.907	0.768
我認為在規劃旅遊業發展時,我們需要有一個長遠的眼光	0.814			
我認為成功的旅遊管理需要先進的規劃策略	0.916			
我認為當我們計劃旅遊業時,我們不能目光短淺	0.896			
以社區為中心的經濟		0.813	0.815	0.594
我認為澳門居民應從旅遊收益中獲得一個公平的份額	0.670			
我認為澳門居民應有更多機會投資旅遊業發展	0.808			
我認為旅遊業必須為澳門社區的改善作出貢獻	0.825			
確保遊客滿意度		0.775	0.775	0.538
我認為旅遊業必須確保遊客的優質旅遊體驗	0.843			
我認為旅遊企業有責任滿足遊客的需求	0.641			
我認為社區吸引力是吸引遊客的核心生態要素	0.701			
最大化社區參與		0.708	0.706	0.549
我認為澳門居民的全面參與是澳門旅遊業成功發展的必要條件	0.784			
我認為澳門居民應被賦予參與旅遊業決策的機會	0.696			
總體態度		0.708	0.707	0.549
我認為旅遊發展對澳門造成的影響總的來說是正面的	0.776			
我認為旅遊業給澳門帶來的收益大於成本	0.704			
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		0.922	0.922	0.663
我支持在澳門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	0.897			
我曾/現正參與與可持續旅遊發展相關的計劃	0.750			
我曾/現正參與當地居民和遊客的文化交流	0.831			
我配合旅遊規劃和發展計劃	0.766			
我遵守環境標準規範以減少旅遊的負面影響	0.799			
我參與/支持促進環境教育和保護的工作	0.835			

註:CR=composite reliability 組合信度; α =Cronbach's alpha; AVE=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平均方差提取值。

所有因子負荷量在 0.01 水平上顯著

表 4 總測量模式區分效度:異質-單質比率

		1	2	3	4	5	6	7	8	9
1	環境可持續性									
2	感知經濟效益	0.641								
3	感知社會成本	0.165	0.111							
4	長期規劃	0.766	0.657	0.203						
5	以社區為中心的經濟	0.691	0.673	0.269	0.729					
6	確保遊客滿意度	0.579	0.785	0.055	0.685	0.822				
7	最大化社區參與	0.768	0.855	0.162	0.793	0.873	0.799			
8	總體態度	0.483	0.818	0.205	0.462	0.620	0.793	0.540		
9	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	0.635	0.831	0.187	0.600	0.644	0.763	0.717	0.844	

4.3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所有研究假設運用 PLS-SEM 來檢驗。結果(表 5)顯示,感知經濟效益(H2: $\beta = 0.412, p < 0.001$)、以社區為中心的經濟(H5: $\beta = 0.192, p < 0.010$)、確保遊客滿意度(H6: $\beta = 0.323, p < 0.001$)都對總體態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感知社會成本(H3: $\beta = -0.171, p < 0.001$)對總體態度有負向影響。因此,H2、H3、H5、H6 都得到

支持。此外,總體態度(H8: $\beta = 0.685, p < 0.001$)可以顯著預測對可持續旅遊發展的支持度,證實了對 H8 的支持。然而,環境可持續性和長期規劃被認為與總體態度無顯著相關性。儘管最大化社區參與(H7: $\beta = -0.187, p < 0.010$)對總體態度有顯著影響,但其方向與預期不同。因此,H1 和 H4 沒有得到支持。此外,該結構模型可以解釋總體態度中 49.8% 的變異,以及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中 46.9% 的變異。

表 5 研究假設結果

	研究假設	β	p	結論
H1	環境可持續性 → 總體態度	0.094	0.153	不支持
H2	感知經濟效益 → 總體態度	0.412	0.000	支持
H3	感知社會成本 → 總體態度	-0.171	0.001	支持
H4	長期規劃 → 總體態度	-0.078	0.217	不支持
H5	以社區為中心的經濟 → 總體態度	0.192	0.010	支持
H6	確保遊客滿意度 → 總體態度	0.323	0.000	支持
H7	最大化社區參與 → 總體態度	-0.187	0.004	不支持
H8	總體態度 → 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	0.685	0.000	支持

本研究亦使用 SmartPLS 測試了總體態度在 SUS-TAS 7 個因素與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之間的關係的中介作用。為了評估潛在的中介效應,我們採用了間接效應,使用偏差校正的引導置信區間(95% CI)評估間接作用是否顯著。對間接效應的檢驗表明,總體態度可以在感知經濟效益、感知社

會成本、以社區為中心的經濟、確保遊客滿意度和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之間的關係起到中介作用;然而,總體態度未能在環境可持續性、長期規劃和最大化社區參與和支持度之間的關係中起到中介作用,結果表明對 H9 的部分支持(表 6)。

表 6 中介作用(H9)

間接效應	β	偏差校正的引導 置信區間(95%)	結論
環境可持續性 → 總體態度 → 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	0.064	[-0.021, 0.153]	
感知經濟效益 → 總體態度 → 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	0.282***	[0.185, 0.382]	
感知社會成本 → 總體態度 → 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	-0.117**	[-0.184, -0.039]	
長期規劃 → 總體態度 → 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	-0.053	[-0.148, 0.024]	部分
以社區為中心的經濟 → 總體態度 → 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	0.132*	[0.039, 0.241]	支持
確保遊客滿意度 → 總體態度 → 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	0.221***	[0.124, 0.325]	
最大化社區參與 → 總體態度 → 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	-0.128**	[-0.214, -0.042]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驗證 SUS-TAS 量表在博彩旅遊目的地的適用性,並測試其對居民態度的預測能力,以及居民總體態度在 SUS-TAS 和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之間的中介作用。結果發現,該量表在不同的背景下(博彩旅遊目的地)表現出足夠的信度、收斂效度、區分效度和預測有效性。

5.1 理論意義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有兩個方面。首先, SUS-TAS 是一個值得持續探索的量表。與之前在西方國家(Choi & Sirakaya, 2005; Zhang, et al., 2015)或島國(Ribeiro, et al., 2018)進行的研究不同,此次研究對 SUS-TAS 在一個亞洲的博彩旅遊目的地的適用性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驗證了 21 題項版本在不同文化不同類型的旅遊目的地背景下的效用,支持了 Zhang 等人(2015)和 Ribeiro 等人(2018)的結果。該版本有充足的信度和效度,且具有最為簡約的特性,確實有利於其“在大範圍的旅遊實踐中的廣泛應用”(Zhang, et al., 2015, p. 753)。

其次,本研究建立了一個概念模型,將

整體態度作為 SUS-TAS 和支持可持續旅遊發展之間的中介因子,並發現整體態度在感知社會成本、感知經濟效益、以社區為中心的經濟和確保遊客滿意度與可持續旅遊發展支持度之間起到了顯著的中介關係。這些結果意味著居民認為旅遊業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為他們的社區吸引了更多的投資,並為當地人和企業帶來了經濟利益,從而獲得居民的支持(Prayag, et al., 2013; Yoon, et al., 2001)。他們(Prayag, et al., 2013; Yoon, et al., 2001)也發現負面的社會影響和總體影響認知的反向關係,表明無論旅遊發展會給目的地帶來什麼好處,居民都認為旅遊是一種經濟發展,會必然產生相應的社會問題。此外,研究表明遊客滿意度對居民的態度及支持度有積極影響,由此可見居民亦意識到遊客滿意度對旅遊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因此,旅遊目的地可以邀請居民為旅客共建難忘的旅遊體驗,以實現可持續旅遊的發展(Denman, 2003; Wan & Li, 2013)。

然而,本研究發現環境可持續性和長期規劃未能顯示出對整體態度的顯著影響,因此對可持續旅遊發展的支持亦是如此。儘管有研究發現,居民感知到的環境影響和總

體態度及支持度之間存在關係,即當地居民認為旅遊發展造成了擁擠、噪音、污染和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從而影響其對整個旅遊發展的感知,導致其對旅遊發展的不支持(Prayag, et al., 2013; Yoon, et al., 2001)。更令人驚訝的是,長期規劃被發現與居民感知的總體態度及支持度有負面的關係,這很有可能是澳門居民對政府的規劃和項目失去信心。澳門重大基礎設施項目頻頻出現嚴重的預算超支和延誤,如澳門輕軌系統。澳門輕軌系統主線工程於 2012 年 2 月動工,歷時長達 7 年之久才完成氹仔段;澳門輕軌成本預計隨著時間亦不斷增長,項目造價由 2009 年估算的 75 億一直追加,氹仔段最終造價已高達至 101 ~ 102 億澳門元。不僅是基礎設施專案,公共專案也缺乏透明度,不向公眾披露支出、財務報告和細節,如澳門基金會的資金就因補貼模糊而被立法者質疑(Asia gaming brief, 2016)。

5.2 實際意義

本研究也為旅遊政策制定者和規劃者提供了實際意義。基於對居民的總體態度獲得新見解,以了解居民對於旅遊發展所造成不同衝擊之感知以及對可持續旅遊發展之態度,作為對未來旅遊業發展的貢獻。本研究發現感知經濟效益和以社區為中心的經濟對整體態度和支持度有積極影響,而感知社會成本有負面影響。即使積極影響高於負面影響,旅遊政策制定者和規劃者仍需要強化具有正面的影響活動和改善負面的問題,以確保可持續旅遊發展,保持旅遊目的地的競爭力。因此,政策制定者在不斷為社區帶來更多經濟效益的同時,為了長期的

可持續性,他們也需要盡量減少感知社會成本。溝通是提升可持續旅遊發展的工具,可加強資訊散播。融入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來提升居民的支持。同時建議加強長期旅遊規劃的信息,鼓勵居民不同層次的參與和規劃諮詢,使居民對旅遊規劃有一定程度的感知與貢獻。更重要的是,若使旅遊目的地內的產品更具可持續性,這取決於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需求,他們在旅遊規劃發展過程中承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不同的作用。

此外,可持續旅遊發展能夠使居民受惠,它可以通過收入、就業和稅收從大眾旅遊和可持續旅遊中受益(Haralambopoulos & Pizam, 1996)。在長期旅遊規劃過程中,感受最深切就是居民,應該使居民了解旅遊業的發展可以為社區帶來什麼影響,包括積極的影響以及負面的影響。同時旅遊目的地從業者可提供可持續性的營運模式,例如購買當地食材、物資,以及使用本地服務來幫助本地經濟發展。提出提升居民支持旅遊可持續發展的可行性對策,達到可持續旅遊發展的目的。更應了解遊客願意支付的價格以便提供各種體驗供遊客享受,促進目的地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Birch 和 Memery(2020)建議鼓勵遊客在旅遊目的地逗留更多的天數,從而有助於當地產品的銷售,使當地經濟和社區受益。由於旅遊目的地面臨著旅遊急速發展所帶來的挑戰,在可持續目的地管理方面需要改進規劃和政策,保持居民和遊客之間的平衡,從而進一步提高目的地的競爭力。本地旅遊企業要以同樣的方式迎合居民和旅客的需要,否則,如果當地居民覺得他們不受歡迎,他們可能會

審查他們對遊客的負面情緒。如果旅遊目的地通過長期的規劃來確保居民和遊客之間的關係,那麼就可以確保目的地的旅遊業可持續發展。但是,政府需要先贏得居民對其長期規劃的信心。

6 研究局限及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有以下幾個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樣本量相對較小,因此,對本研究結果的通用性應該謹慎看待。其次,本研究是橫斷面研究,而居民對可持續旅遊發展的態度和支持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因此,應該進行縱向研究以跟蹤可能發生的變化。再次,本研究數據是在 COVID-19 爆發之前收集的,由於 COVID-19 影響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導致居民對旅遊發展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Lim & To, 2021; Sigala, 2020)。因此,可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和結束之後再次收集數據,以評估居民態度和支援度可能發生的變化。最後,本研究只採用了 SUS-TAS 來解釋居民態度和他們對可持續旅遊發展的支持。其他重要因素,如情感團結(emotional solidarity)(Woosnam, 2011a, 2011b, 2012)、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Hao, et al., 2011),也應該納入模型,以更好地理解居民對旅遊業發展的態度和支持度。

參考文獻

- [1] Anderson, J. C., & Gerbing, D. W. (198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ractice: A review and recommended two-step approa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3), 411-423.
- [2] Ajzen, I. (2001). Nature and operation of attitud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2(1), 27-58.
- [3] Ap, J. (1992). Residents' perceptions on tourism impact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4), 665-690.
- [4] Asia Gaming Briefing. (2016). Legislator calls for transparency into Macau found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agbrief.com/news/legislator-calls-transparency-macau-foundation>.
- [5] Bagozzi, R., & Yi, Y. (1988). On the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6(1), 74-94.
- [6] Baker, M. A., Davis, E. A., & Weaver, P. A. (2014). Eco-friendly attitudes, barriers to participation, and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at green hotels. *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 55(1), 89-99.
- [7] Birch, D., & Memery, J. (2020). Tourists, local food and the intention-behaviour gap.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43(6), 53-61.
- [8] Bramwell, B., & Lane, B. (1993). Sustainable tourism: An evolving global approach.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1), 1-5.
- [9] Butzmann, E., & Job, H. (2017). Developing a typology of sustainable protected area tourism products.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5(12), 1736-1755.
- [10] Çelik, S., & Rasoolimanesh, S. M. (2021).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cost-benefit attitudes,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A pre-development perspective. *Tourism Planning & Development*, (2), 1-19.
- [11] Chin, W. W. (1998).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G. A. Marcoulides (Ed.), *Modern methods for business research* (pp. 295-336).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12] Choi, H. S. C., & Sirakaya, E. (2005). Measuring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tourism attitude scale.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43(4), 380-394.
- [13] Denman, R. (2003). Tourism and local agenda

21: The role of local authorities in sustainable tourism: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 [14] Fornell, C., & Larcker, D. F.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1), 39-50.
- [15] Gursoy, D., Jurovski, C., & Uysal, M. (2002). Residents attitudes: A structural modeling approach.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9(1), 79-105.
- [16] Hair, J. F., Hult, G. T. M., Ringle, C., et al. (2016). *A primer on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 Sage publications.
- [17] Hall, C. M. (2019). Constructing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2030 agenda and the managerial ecology of sustainable tourism.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7(7), 1044-1060.
- [18] Hao, H., Long, P., & Kleckley, J. (2011). Factors predicting homeowners'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50(6), 627-640.
- [19] Haralambopoulos, N., & Pizam, A. (1996). Perceived impacts of tourism: The case of Samo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3(3), 503-526.
- [20] Henseler, J., Ringle, C. M., & Sarstedt, M. (2015). A new criterion for assessing discriminant validity in variance-ba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43(1), 115-135.
- [21] Hsu, C.-Y., Chen, M.-Y., Nyaupane, G. P., et al. (2020). Measuring sustainable tourism attitude scale (SUS-TAS) in an Eastern island context.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33(3), 100617.
- [22] Kim, K., Uysal, M., & Sirgy, M. J. (2013). How does tourism in a community impact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Tourism Management*, 36(3), 527-540.
- [23] Lee, T. H. (2013). Influence analysis of community resident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ism Management*, 34(2), 37-46.
- [24] Li, X., & Wan, Y. K. P. (2013).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Macao: A path model. *Tourism Analysis*, 18(4), 443-455.
- [25] Lim, W. M., & To, W.-M. (2021). The economic impact of a global pandemic on the tourism economy: The case of COVID-19 and Macao's destination- and gambling-dependent economy.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1-12. DOI: 10.1080/13683500.2021.1910218
- [26] Lv, Q., Xie, X., & Li, Y. (2019).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benefits on place affect: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values and non-material life satisfactio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4(1), 1-13.
- [27] McGehee, N. G., Andereck, K. L., & Vogt, C. A. (2002). An examin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in twelve Arizona communit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2 Travel and Tourism Research Association Conference, Boise, ID.
- [28] Noor, S.M., Rasoolimanesh, S.M., Jaafar, M., et al. (2019). Inscription of a destination as a world heritage site and residents' perception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4(1), 14-30.
- [29] Nunkoo, R., & So, K. K. F. (2016).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Testing alternative structural models.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55(7), 847-861.
- [30] Pasquinelli, C., & Trunfio, M. (2020). Overtouristified cities: An online news media nar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8(11), 1805-1824
- [31] Passafaro, P. (2020). Attitudes and tourists' sustainable behavior: 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discussion of som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59(4), 579-601.
- [32] Phau, I., Quintal, V., Marchegiani, C., et al. (2016). Looking beyond pasta and pizzas: Ex-

- aming personal and historical nostalgia as travel mo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10(3), 296-309.
- [33] Pizam, A. (1978). Tourism's impact: The social cost to the destination community as perceived by its Residents.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6(4), 8-12.
- [34] Prayag, G., Hosany, S., Nunkoo, R., et al. (2013). London residents' support for the 2012 Olympic Gam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verall attitude. *Tourism Management*, 36(6), 629-640.
- [35] Ribeiro, M. A., Pinto, P., Silva, J. A., et al. (2018). Examining the predictive validity of SUS-TAS with maximum parsimony in developing island countries.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6(3), 379-398.
- [36] Sharpley, R. (2009).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Beyond sustainability?* London:Routledge.
- [37] Sigala, M. (2020). Tourism and COVID-19: Impa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and resetting industry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17(C), 312-321.
- [38] Sirakaya-Turk, E., Ekinci, Y., & Kaya, A. G. (2008). An examination of the validity of SUS-TAS in cross-cultures.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46(4), 414-421.
- [39] Sirakaya-Turk, E., & Gursoy, D. (2013). Predictive validity of sustas. *Tourism Analysis*, 18(5), 601-605.
- [40] Su, L., Huang, S., & Huang, J. (2018). Effects of destin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ourism impacts on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and perceived quality of life.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42(7), 1039-1057.
- [41] Tse, T. S. (2015). A review of Chinese outbound tourism research and the way forward.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11(1), 1-18.
- [42] Vogt, C. A., Andereck, K. L., & Pham, K. (2020). Designing for quality of life and sustainabilit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83, 102963.
- [43] Wan, Y. K. P., & Li, X. (2013). Sustainabil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Macao,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15(1), 52-65.
- [44] Woosnam, K. M. (2011a). Comparing residents' and tourists' emotional solidarity with one another.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50(6), 615-626.
- [45] Woosnam, K. M. (2011b). Testing a model of Durkheim's theory of emotional solidarity among residents of a tourism community.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50(5), 546-558.
- [46] Woosnam, K. M. (2012). Using emotional solidarity to explain residents' attitudes about tourism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51(3), 315-327.
- [47] Yoon, Y., Gursoy, D., & Chen, J. S. (2001). Validating a tourism development theory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urism Management*, 22(4), 363-372.
- [48] Yu, C.-P., Chancellor, H. C., & Cole, S. T. (2011). Measuring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sustainable tourism: A reexamin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tourism attitude scale.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50(1), 57-63.
- [49] Zhang, Y., Cole, S. T., & Chancellor, C. H. (2015). Facilitation of the SUS-TAS application with parsimony, predictive validity, and global interpretation examination.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54(6), 744-757.
- [50] Zimmer, M. R., Stafford, T. F., & Stafford, M. R. (1994). Green issues: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30(1), 63-74.
- [51] Zografos, C., & Allcroft, D. (2007). The environmental values of potential ecotourists: A segmentation study.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5(1), 44-66